

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学术资源与理论框架*

郭定平**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存在不足,与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必须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注重发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和借鉴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框架看,可以在政治社会、国家建构、治理体系、政治过程、政党治理和治理绩效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率先形成知识积累。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理论创新和知识积累过程,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 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创新;自主知识体系

比较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与社会科学的其他主要基础学科相互交叉,在当代学术发展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引人瞩目。当代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

* 本文是根据2022年8月作者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的中国政治学教学法讲习班上的发言稿修改、补充而成,参加讲习班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沈大伟博士协助整理了部分内容,在此一并致谢。

** 郭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十余年中,随着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发展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已经成长为一门显学,并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重大的成就。但是,如何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体系,这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对照 2022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这个目标,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此我结合教学和研究,着重谈一谈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框架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一、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即便有一段时期没有独立的政治学科,仍有不少学者和研究部门对外国的政治发展进行介绍和分析,并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则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要“补课”的任务之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一些学者开始引进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论成果,还有一些学者尝试建构自己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前者以 1987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人的著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是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王沪宁著)。此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比

较政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追赶型学术发展的阶段”。^①大量成果以国外比较政治理论前沿综述和地区国别政治发展评述为主,也有少数运用严谨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的前沿性专题研究。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看,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比较政治学。

第一是以研究区域来定义比较政治学。有的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比较宽泛,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要做比较的,因此可以说,“现代的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就是现代的政治学”。^②但具体看,现代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其实是有差异的。我们通常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解,就是要对世界各国的政治,乃至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政治进行一些比较。比如,在中国,上海的政治和北京的政治可以比较。在日本,关东政治和关西政治也可以比较。所以,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也有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政治的比较。这样一来,我们讲的比较政治学就成了“政治学”,政治学各个方面的内容,比较政治学也都研究。但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特别是进行学科建设和大学教育时,你不能说政治学涵盖一切,或者说比较政治学涵盖一切,彼此还是要有一个基本区分的。比如说在美国,美国政治就不在“比较政治学”里面,所以在美国的学术分类和学科分类中,有一类叫“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另有一类叫“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二者是并列的。所以在美国的大学里,比较政治学是指美国政治以外的各国政治。这就是按照研究区域来定义比较政治学。如果这样定义,其实比较的区域是相对的,比如在中国,我们单独开一门“中国政治”的课,比较政治就是讲中国以外的政治,美国政治则被纳入“比较政治”中了;在日

^① 房宁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研究 7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312 页。

^② 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7 页。

本,如果单独开一门“日本政治”的课,比较政治就是讲日本以外的政治,那么美国政治和中国政治都被纳入“比较政治”中了。所以,如果按照研究区域来定义比较政治学,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的区域。而且从历史演变看,我们发现比较政治学也涵盖了差不多所有的区域。比如亚里士多德当时研究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他不是研究某一个城邦,而是研究所有的城邦,《政治学》这本书内容就涉及很多城邦,我们称之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当代政治学的大发展也是基于很多的区域研究,当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会比较多一点。

从当前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看,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其地域的覆盖面已经大大扩展。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推动比较政治学发展,主要是关注一些西方大国和少数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和国际交流的扩大,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关注对象已经逐渐扩展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推动在全国一些力量较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比如在复旦大学就有美国研究基地。二是在2011年,教育部推出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并于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我们提出的基本目标就是全覆盖,就是说国别和区域研究要把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覆盖到。最近几年,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大学里设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非常多,包括针对过去我们不太关注的一些小国家,也都有了相应的国别研究中心,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正朝着向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全覆盖的目标迈进。^①

第二是从研究方法来定义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在名称上体现了方法论的含义,很多人认为,比较政治学是以“比较”方法

^① 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

见长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很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随着比较研究方法训练的普及和国别研究数据资料的开放应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一般求同法和求异法的运用,而引入了各种以田野调查、访谈观察、数据分析、实验模拟等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开展了大量的舆论调查和问卷调查,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库资料,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世界各国的晴雨表调查等。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利用这些数据库开展数据分析方面的比较研究。

复旦大学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开展研究起步比较早,发展比较快。早期的成果之一就是由曹沛霖、徐宗士老师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曹老师在前言中说,关于比较政府体制,既要研究“共性”,也要研究“个性”,通过分别研究每个国家的“个性”,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共性”,因为“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新近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我看到谭君久老师有一篇很好的文章。谭老师是中国比较政治学领域非常资深的学者,从我们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谭老师他们翻译的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体》一书现在已经正式列入商务印书馆的政治学名著系列了。谭老师在讨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时,提出要鼓励百花齐放,我也非常认同。他指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一旦某种方法被绝对化、神圣化,就会产生排他性;比较政治的研究就会因此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而只有研究视角的多角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让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趋近于全面和真实,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产生“无影灯”的效果。^①

^① 谭君久:《无影灯下看世界——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思考》,李路曲主编:《比较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辑。

第三是以研究视野来定义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虽然名曰“比较”，但很多情况下并不表现为严格的、明显的国家之间的比较，潜在的比较也算“比较”，只要有比较的意识、比较的视野或者比较的参照物，这样的研究就可以算“比较”。比如说当代中国的学者研究外国政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中国”；反过来说，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他们的心目中也会有不止一个参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的视野也构成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从当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看，关注和研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传统的比较政治学过多地重视欧美大国的政治经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和经验没有在学术研究中给予足够的重视。清华大学的刘瑜博士认为，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说，如果只关注发达国家就可能存在一种视野上的局限，因为那样获得的政治知识可能就是“优胜者偏见”，因此更为完整的比较视野就应该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因此，拓展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将会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更多的理论创新。

二、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学术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大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同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要求“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

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提出要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当然也是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要求。加快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是所有政治学人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我们每个学科甚至每个分支学科都面临这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来说,如何在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并有所成就,这是我很愿意跟大家讨论和分享的问题。

这里我首先要提出一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更基本的问题。大家知道,托马斯·库恩在分析科学革命的时候提出了范式这个重要的概念,认为科学革命就是靠范式转换来实现的。库恩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历史发展中确实经历过重大的范式转换。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资深的科学家接连自杀了,因为他们原来构筑的思想体系崩溃了,之所以会崩溃,是因为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科学家推进了科学革命,导致了科学研究中范式的根本转换。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中同样也存在这种科学革命和范式转换。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社会科学当中像自然科学那样典型的科学革命是比较少发生的,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的,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很少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中

^①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2页。

任何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同时也要消化、吸收、整合人类思想发展宝库中的各种有益、有用的思想资源。法国著名社会科学学者马太·杜甘就曾经举例说,马克思在他 1721 页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有 296 页提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杜甘指出,社会科学的进步主要是因为科学的传承和知识的积累。^①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也要基于科学的传承和知识的积累。那么,我们有哪些学术资源可资借鉴呢?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指导思想,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供了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当然,我们不能教条僵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世界各国,即便是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少人其实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很多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学者事实上就是资深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比如佩里·安德森、巴林顿·摩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迈克尔·布若威等,这些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但你是否认真研究过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呢?这样的名字在当代比较政治学学者中还有长长的一串。相反,我们在评论我们的青年教师、博士和硕士的论文时,经常说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做了很好的研究,实际上不少都是客套话。现在很多年轻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是很普遍

^① [法]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文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8—119页。

的,而且杰出的研究成果也很多,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和更大的重视。

当代比较政治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在民主转型研究中(也包括在研究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很多人都倾向于从结构论和能动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并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太熟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不太了解,一看到西方比较政治学中关于结构论和能动论的一些说法就觉得如获至宝,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举例来说,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大家应该都知道,恩格斯曾评价这本书是把结构论和能动论有机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在该书1869年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还提到了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另外两本著作,一本是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另一本是浦鲁东的《政变》。前者强调了个人的能动作用,后者偏重分析宏观历史结构。而马克思则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他指出,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历史当然是由人来创造的,但是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第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和“魂”,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构建必须扎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伟大的思想。只有得到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滋养,才能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挖掘中华文明的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在此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

上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①现在不仅我们自己越来越重视这些伟大的思想，国外学者也很重视。我注意到，十多年前一些学者合作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政治学的未来》，该书编者邀请了全世界 100 位政治学大家一起来探讨政治学的未来该怎么走，该研究什么。其中有一篇是麦克法夸尔写的，他讲的一个最核心的主题就是要研究中国。这是麦克法夸尔去世前留给世界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忠告。他讲到，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特政治体制一定值得引起所有政治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导致这一体制持续再生的政治文化因素究竟是什么？中国制度的特殊性表明它或许应该是理论输出而不是输入的基础。^②因此，基于中国具有深厚底蕴的政治文化传统而进行的中国政治研究就应该而且能够结出理论创新的累累硕果，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提供鲜活的案例资料和崭新的理论范式。

第三是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外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积累深厚，因此消化、吸收和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研究资料。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从零做起，只有借助国外研究的资源，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更重要的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上，否则我们的研究就难以被别人认可，就会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所以我特别强调，只有交流才能知己知彼，只有对话才有创新超越。

① 习近平：《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15 页。

② Roderick MacFaquhar, “Study China”, Garry King,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Norman H. Nie, e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100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9, p. 190.

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发展到今天,那些重要的研究进展基本都有共同的研究路径。比如吉列尔莫·奥唐奈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比较政治学,他的老师就包括罗伯特·达尔、胡安·林茨、斯特潘等大家,后来他本人也获得了国际政治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在学习研究中也并没有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而是结合他自己的南美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创新概念,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官僚威权主义。他的著作已经翻译出版了中文版,书名是《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再比如,原东京大学教授蒲岛郁夫退休后参加熊本县知事选举,现在是熊本县的知事。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他的导师团队包括亨廷顿、维巴、赖肖尔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是他也没有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而是结合自己的东亚研究,有创新,有发展,有些还挑战了前人的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支持发展参与模式。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现代化会导致不稳定,因为现代化会动员参与,在制度化水平还不够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参与就是破坏性的。蒲岛郁夫挑战了这一理论,他运用日本的实证资料,在世界比较政治学最著名的旗舰刊物《世界政治》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支持性参与”(supportive participation)。亨廷顿在看到了蒲岛的研究结论后,在他自己的书里也承认,这样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他写道:“怎样使经济目标的实现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互相调和的跨学科研究较为罕见。蒲岛郁夫指出了怎样才能调和民主、增长与平等的矛盾。”^①这就使得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深刻的。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比较政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原本就来源于区域国别政治发展经验,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当代罗伯特·达尔的《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吉列尔莫·奥唐奈的《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它们都是以区域国别政治发展经验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各自的创新理论,从而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凝炼。从一定意义上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当前中国学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运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提炼概括出一些新的概念,使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发展再向前迈进一大步。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提炼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今天发展成就的讨论,在海外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早就是重大的研究主题了。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麦克法夸尔在1960年就创办了《中国季刊》杂志,这本杂志现在是海外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关注中国的旗舰刊物。所以说,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研究早就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主题。我们现在必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这一研究推向前进。因为过去海外学者研究得很多,海外研究往往存在偏见和一些内在的局限性,我们要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篇幅不长,但提纲挈领,高度概括,于是为我们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概念和理论提供了启示和指导。比较遗憾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和学生一看到这个文件,就把它当作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我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和歪曲。这份决议应

该得到大家足够的重视,大家要好好阅读和认真学习,看如何从中做出一些大文章、好文章,从而推动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三、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目前还处于摸索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框架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认真消化、吸收和借鉴国外比较政治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并将之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以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

下面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体会,我想谈几点认识,谈谈哪些方面是值得重视的,哪些方面是有发展潜力的。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但是仅仅提出这样的口号不管用,关键是我们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认真研究,久久为功,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研究做得严谨踏实,才能真正得到国际比较政治学界同行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形成一些新的共识。一个大的方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指导,结合各国政治发展实际,重新定义比较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政治、国家、政府、政党、制度、治理等,重新阐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人民等重大关系,推动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例如,我注意到黄宗智先生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出倡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反思西方学术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传统的西方社会科学倾向于采用两分法,然后强调二元对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以及政商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黄宗智先生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二元对立思维常常无视经验证据和实际发展,现代中国必定是过去与现在并存、中国与西方相互渗透的结果,现代中国经济更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中国的快速发展经验而言,把国家与市场设定为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元,可以说是完全不得要领。^①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计划里面有市场,市场里面也有计划。现在西方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哪个没有计划?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早就推动发展市场经济了。东亚那些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都是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吗?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要重新理解、重新定义很多基本的概念,重新阐释很多重大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

下面结合若干实例来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关于政治社会的比较分析,这是我们复旦政治学的一个传统了。它强调要把各国特定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现象放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去分析和考察。早在1987年,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就试图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中比较分析各种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此后,王邦佐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项目,其中就特别提出要从社会生态的角度研究政党制度。他们分别出版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和《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认为“各国政党制度是各特定民族国家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此具有互不相同的个性”。^②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即各国的政治模式和

^① 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60—63页。

^② 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7页。

政治现象都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这样我们理解政治现象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思维,就会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单线发展模式,就会发现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多样化的,不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比如大家都知道西方的人权理论,人们对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很熟悉,它们都反映了西方非常典型的天赋人权观。如果我们用全新的观念来透视的话,其实并非如此。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就指出,即便是在西方,也并不是天赋人权观一统天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埃德蒙·柏克就发展出了一套“人赋人权观”,他的定义是:“它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是人类历代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①在中国,我们对人权也很重视,党的文件乃至《宪法》中均明确强调要尊重和保护人权。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要怎样结合我们的历史传统来建构我们自己的人权观念呢?华中师大的徐勇教授就曾经提出过一个“祖赋人权”的概念,可能对其还有争议,但它开辟了一条理解人权观念的新路径。

第二,关于国家建构的比较分析。国家建构是比较政治学中的重大主题,传统政治学和当代政治学对之都有很多研究观点。但总体说,其基本都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国家分类方式,甚至是简单基于意识形态的国家分类方式,这我们是无法认同的。如今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我们越来越觉得那些西方的观念非常片面。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因提出历史终结论红极一时。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而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取得最后胜利之后,西方学者再也想象不出还会有其他什么社会政治体制是重要的、合法的、可供选择的。所以福山说历史发展到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就结束了,福山这样的认识是很傲慢也是很无知的。

^① 何兆武:《苇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30页。

后来我们邀请福山到中国来访问,他在复旦也访学了一段时间,跟很多中国的学者进行讨论,然后他的思想观念和他的研究在我看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史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道:“我们理解的现代国家的很多要素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已经存在了,比它们在欧洲出现要早 1800 多年;但是西方的政治发展研究很少提到中国率先发展国家制度的先进经验。”他后来把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概括为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其实这三者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否则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不可能这么发达,延续性这么强。再联想我刚才提到的麦克法夸尔说要研究中国的政治文明史、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从中我们可以有大量新的发现。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和查尔斯·蒂利他们概括的西方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将会对未来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建构有所帮助。这当中就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涉及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建构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正如著名政治学者林尚立所言:“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①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建设的先进经验和现代中国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都会对比较政治学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极大裨益。如果我们再放眼东亚国家,那关于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问题就更多了。也就是说,如果纳入了更多国家的经验,由西方建构的关于国家建构的那套概念和理论就远远不能解释清楚了。比如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提炼。

^①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第三,关于治理体系的比较分析。任何一个大国都面临着建构一个合理的治理体系的问题,治理体系本质上是指公共权威回应公众愿望与需求,并向全体社会行使公共权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庞大的复杂网络。世界各国的治理体系差别很大,比如纵向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联邦制与单一制,以及横向的集中统一与分立制衡、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比较,如何判断优劣呢?这不能一概而论,既要将其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分析,也要放到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来考察。

中国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治理体系,我把它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①对于这套治理体系,目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尚未进行系统概括、总结、提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理论提炼的工作呢?这种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形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和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不同,是一种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它不仅创造了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新范式,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新经验。^②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是一个从中国的成功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对于分析和研究其他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它已经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应用。

第四,关于政治过程的比较分析。政治过程研究也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涉及从输入到输出以及反馈的很多环节,具体包括民意表达、民众参与、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页。

② 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党政领导人的选举和任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多方面内容。这些是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等人在《比较政治学》里强调的,曾几何时很多人对此奉为圭臬,但是这些概念和理论就能够解释一切了吗?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要解释和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复杂的政治过程,这些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不断发展和丰富。特别是当代西方国家往往把政治过程简化为选举过程。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都围绕多党竞争选举展开,是一种以选举为中心的过程,西方的民主蜕变为选举民主,政策制定和执行演化为多党围绕选举的讨价还价。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所强调的政治过程要比这充实、丰富得多。我们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其中就包括全体人民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一种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①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能为比较政治学开辟出新的研究方向,而且能为不同国家的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第五,关于政党治理的比较分析。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西方各国的历史局限,其并没有建立与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的政党治理的法治、体制和机制。现在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与此有直接关系。政党组织不断壮大,但又没有完善的政党治理制度,于是很多国家的政党治理乱象丛生,早期有米歇尔斯的“政党寡头统治铁律”对此进行分析和揭示,如今欧美各国政党政治的民粹化、极端化和派系化愈演愈烈,在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个人化政党、企业型

^① 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60—261页。

政党、家族型政党。因此,加强政党治理的比较研究、改善政党治理的基本状况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我认为,政党治理应该是或者说一定会发展成为比较政治学中很重要的主题。既然政党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那么政党自己首先要治理好,就是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在加强政党治理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很多概念和理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最近,我们刚刚把党史党建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是我们过去的党史党建研究,在我看来学术性不足。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借此机会,把我们的党史党建研究跟政治学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史党建研究进一步学科化、科学化、学术化、实证化,这样就能为政党治理的比较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和理论来源。

第六,关于治理绩效的比较分析。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受到西方中心论和冷战意识形态的严重误导,片面强调政体形式和政体差异,从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把政体类型简化为“民主与独裁”或“民主与威权”;从线性历史观出发,把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理解为“从独裁体制到民主体制”;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提出“民主促进发展”和“民主促进和平”等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这些传统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在面对“一个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强大中国”时完全失去了解释能力而显露出“时过境迁的局限”。^①这就为重新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和创新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与西方政治学传统强调政体与政道不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强调治道与治术,基于民本思想传统,强调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爱民、保民、惠民、安民、利民。现在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过程中,应该强调回归政治学研究的原初和经典

^① [德]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石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5页。

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公共权威和秩序,二是经济发展和繁荣。这样我们的比较政治学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牢固的基础,也会有更好的理论创新前景。

四、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创新前景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与中国的大国成长密切相关。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联系,中国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这就需要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有更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既然是大国,我们就要有自己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想清楚、讲清楚,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所以,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但是对之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强调我们政治学者要有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在总结和提炼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观察和分析世界各国政治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问题,运用科学的理论和严谨的方法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

与此同时,我们要把握好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关系,不能偏废,否则不仅难有成就,还会误入歧途。一方面,比较政治学研究必须国际化,否则我们的政治科学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了。反过来说,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不能片面地强调本土化,否则就不是在做学问,而是在搞政治了。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首先必须是学术研究,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国际化,要研究国外政治,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要有规范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学术规范,这样才能发展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必须走本土化路线,否则我们的政治科

学就没有“政治”了。我们现在强调要把学问做到祖国的大地上，要把论文写到祖国的大地上，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是有国别背景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要服务于中国的大国崛起，这其中当然是有“政治”的。所以，要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合理平衡，既不能是“反科学的政治学”(politics against science)，也不能是“无政治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without politics)。这二者当然存在紧张关系，但有这种紧张关系是好事。所以在比较政治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即“创造性紧张关系”(creative tension)。特殊性的地域研究与普遍性的学术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是我们要让这种紧张关系具有创造性。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就不仅能为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能为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学科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Th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ngping Guo

Abstract: Many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as adopted in the late 1970s. However, it is no deniable that there are few brilliant works with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autonomou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which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tate-building in the new era China. In order to develop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imperative to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Marxism as our guiding principle, reinvent and reinterpre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emulate and exploit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foreig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generalize and conceptualize the good practices in the Chinese socialis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ate-

■ 知识传播与学科自主性建构

building,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mental process, party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will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form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a long, gradual and dynamic proces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which needs more input and further efforts by gener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China.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